

年第4期)认为在药师如来立像的手掌中发现三枚铜钱的现象,证明了在佛像手掌中埋纳铜钱的这一做法与粟特人的习俗密切相关。崔峰《粟特文化对北齐佛教艺术的影响》(《甘肃高师学报》2008年第6期)认为北齐造像新样式与西域粟特画风的传入是密切相关的。

景教。罗炤《再谈洛阳唐朝景教经幢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认为,《经幢记》中记录的移居洛阳的一个安国景教家族,证实8—9世纪景教已经在中亚地区具有相当的基础,移居唐朝的粟特人中不仅确有信仰景教者,而且东都洛阳的景教领袖全部是粟特人。

回顾近十年来关于粟特研究的成果,首先,学者们充分利用了新出土的文献、石刻史料等,一方面补充了国内学者对粟特本土历史变迁过程的研究,另一方面着重对入华粟特人的各个聚落的生活方式及其与周围汉人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互动作出深入分析;其次,在粟特人与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诸如贸易往来、艺术传播、文化传承等方面成果卓著;第三,粟特人的宗教信仰问题上,以“萨保”为切入点,学者们比较集中地探讨了入华粟特人的祆教信仰以及其在中国的流变。

但是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第一,在入华粟特人社会生活方面,婚姻形式的演变,粟特人聚落内外婚姻的比较等方面有待深入;第二,没有专门的论著研究入华粟特女性的社会生活;第三,对于粟特人在入居城市的居住形态的研究;第四,粟特商队的贸易网络运作流程;第五,以区域社会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入华粟特人的社会变迁等,都有待学者们深入研究。

孔颖达与《五经正义》研究述略

王 贞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孔颖达(574—648),字仲达(又作冲达),冀州衡水人,孔子后裔,唐代著名经学家、教育家,其在经学上最大的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五经正义》又称《五经义赞》,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永徽四年,《五经正义》颁行天下。《五经正义》是唐朝正式颁行的儒家经典及其注疏的国定本,是唐代学校教育的标准教材。这部书博综古今,义理该洽,在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及教育思想方面颇有建树,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孔颖达及其思想研究现状

生平家世研究。目前关于孔颖达的学术专著还不多见。申屠炉明《孔颖达 颜师古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虽名为人物评传,但内容还是多侧重对孔颖达《五经正义》的整体

研究。张鸿《孔颖达》(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对孔颖达的家世、生平、教育思想、《五经正义》都有探讨,但基本属于普及型读物。陈冠明《孔颖达世系及入唐前行实考》(《阴山学刊》2003年第5期)据相关文献对孔颖达世系、生平、事迹行年逐一进行了梳理考证。刘敏《通经明史的孔颖达》(《历史教学》2000年第10期)、栗希荣、胡恩堂《唐代鸿儒——孔颖达》(《衡水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等文也基本围绕孔颖达的家世生平、经学思想、教育思想等问题展开探讨。此外还有安敏《〈新唐书〉〈旧唐书〉中的〈孔颖达传〉辨异》(《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的个人准备》(《阴山学刊》2009年第2期),前文通过辨析《新唐书》《旧唐书》中有关孔颖达生平记载的异同,指出这些抵牾之处反映了孔颖达及其《五经正义》的尴尬处境;后文则从求学举第、任职受封、从事的讲经、论难、编书活动等方面分析了孔颖达编修《五经正义》个人素质方面的条件和学术基础。

哲学思想。孔颖达的易学理论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潘忠伟《从〈周易正义〉看贵无、崇有、独化三说之融合——试论孔颖达学派与玄学的关系问题》(《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立足于孔颖达与全部玄学的关系的视角对学界热点问题——孔颖达与王弼思想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认为《周易正义》的学说可视为王弼贵无论、裴頠崇有论、郭象独化论三说之融合。张克宾《论孔颖达“备包有无”的易道观》(《周易研究》2006年第2期)认为孔疏中的“无”不是单纯的某种实体或属性,它具有多层含义,是其易学的形上学;而“有”就是宇宙万有,宇宙万有统摄于易象之中,易象是宇宙万有的符示涵摄者,由之提出了灵活开放的易象观;以之为基础,在乾坤父母说之上将易学六十四卦系统诠释成了一个流变互通的意义世界。刘玉建《论唐代易学名家孔颖达的易象观》(《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汉魏易学的绍承、超越与开新——孔颖达新型易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周易研究》2007年第6期)、《孔颖达易学诠释学原则及意义》(《管子学刊》2004年第1期)等文章从孔颖达易学诠释原则、易象观以及对汉魏易学的传承与开新等研究路径分析了孔颖达易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之相关研究还有,刘玉平《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周易研究》2002年第3期)、宋开素《孔颖达易学思想研究》(《周易研究》1995年第4期)、张善文《略论孔颖达对〈周易〉义理学的拓展》(《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等。此外,《五经正义》历来被视为经学诠释文本,但其中不乏阐释周人以礼乐为中心的泛美学思想。乔东义《孔颖达美学思想发微》(《哲学动态》2010年第3期)、《由经学诠释到美学诠释——对孔颖达诠释学思想的一种考察》(《哲学动态》2009年第4期)等文章就孔颖达在中国唐代特定文化语境中如何展开其哲学和美学本体思维,以及这种本体思维对于中国古典美学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孔氏诠释学思想以其特殊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操作方式辐射到审美文艺领域,深刻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理论和审美方式。林国兵、江玉娥《孔颖达易学生命美学思想简论》(《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指出孔颖达承继汉人以象数解易的传统,以元气释易之太极。天(阳气)地(阴气)交感,产生了万事万物、人伦社会。感应之道遍布于宇宙万物,人心感万物所生的念虑之情在自然而然本性的指引下成为审美之情,生生之宇宙由此而成为人情化、审美化的宇宙。

经学思想。刘泽华、张分田《孔颖达的道论与治道》(《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指出孔颖达的自然本体与伦理本位相结合的道论,以礼仁为中心的治国之道和君德论,相互贯通,相互论证,相互补充,形成了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以道为核心范畴,融哲学、政治、伦

理为一体,把理论、原则和操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深层次、多角度地论证了君主政治的一般原则,使儒家的政治学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郭继汾《孔颖达思想略论》(《河北学刊》1989年第3期)认为《五经正义》是唐、宋以来解说五经的标准本,反映了孔颖达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对唐初的政治和宋代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乔东义《孔颖达儒学思想的异质性考论》(《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指出《五经正义》作为有唐一代权威儒学典籍,以儒学正统为宗旨,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儒家立场,另一方面在具体阐释中又融入了道、玄、释等诸家思想质素,从而既表现了孔颖达儒家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显示了中国汉魏以降儒、道、玄、释诸家思想交融互渗、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

文献、修辞学研究。从文献、训诂、修辞、文字等方面探讨孔颖达的专文相当多。相关研究有,乔东义《孔颖达的互文修辞观发微》(《修辞学习》2007年第1期)从词、句、章、篇等不同层面对《五经正义》所论“互文”修辞方法作了梳理阐发。孙云石《孔颖达修辞理论探》(《安庆师院学报》1985年第2期)通过列举比兴等实例探析了孔疏中丰富的修辞理论。杨金花、韩田鹿《论孔颖达的比兴观》(《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从“作文”的角度分析了孔颖达注疏中比和兴的表现方法、形式特征。孙良明《孔颖达关于词的兼类论述》(《山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孔颖达的语辞说》(《山东师大学报》1995年年第1期)、《古籍译注树立语境观的重要性——谈孔颖达的“文势”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5期)等文对孔颖达注疏中的有关语辞说、文势说等进行了考察,对古代汉语研究有一定借鉴作用。王绍东《孔颖达在文献注释方面的成就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指出孔颖达在文献注释方面,采用了既注经文又释传注,考订前注谬误、尊重原经的原则和方法,在训诂学和传统语法学领域亦多有发明。孙迟《昭陵孔颖达碑座上的刻字》(《文物》1979年第12期)、《孔颖达碑与虞世南书法》(《文物》1987年第11期)等文对孔颖达的碑刻做了详细的考证。

文学思想。除了上述立论外,孔颖达的文学思想非常受关注。谢建忠《论孔颖达与唐诗》(《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认为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融经学的政教论与诗学的艺术论为一炉所建构的特殊诗学理论,代表着唐代官方主流意识的诗学话语权威,其中诗缘政作论、任贤使能论和兴必取象论是唐诗中批判现实精神、贤士情怀抒写和比兴象征艺术的主要理论渊源,因而具有重大的文学理论价值。乔东义《论孔颖达对儒家诗学的演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指出孔颖达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儒家诗学观,提出风雅之诗、缘政而作、诗述民志、乐歌民诗、畅怀舒愤、塞违从正等系列命题,倡导承、志、持等新的儒家诗学理念,将诗歌的审美教化功能与审美抒情特性统一了起来。黄贞权《“情缘物动,物感情迁”:孔颖达“情志”诗论》(《名作欣赏》2009年第17期)、《从〈诗〉学到诗学——论孔颖达诗学阐释学思想》(《理论月刊》2010年第10期)等文章认为孔颖达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诗》作为经学的束缚,突破了把《诗》作为“美刺”或“教化”说,从文学的角度来审视《诗》和阐释《诗》,建构了自己的诗学体系。韩宏韬《孔颖达的〈诗序〉观》(《孔子研究》2007年第4期)辨析孔颖达关于《诗序》作者的矛盾之处,认为最终确定为子夏,其目的是为提高子夏的地位,将尊序推向极致,以充分发挥《诗序》的作用,树立经典的权威,服务于时代大一统诗教的需要。王长华、易卫华《孔颖达〈诗〉学观论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指出孔颖达关于“诗有三训”、“诗是乐歌”以及对于“六义”的深入阐释,是孔氏《诗》学观中最有价值的思想,体现了唐

代《诗》学承前启后、兼容并包的风格特点,对唐以后的《诗经》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孙雪萍《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齐鲁学刊》2008年第3期)认为孔颖达《毛诗正义》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关于《诗经》学相关问题的规范和体系,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大一统时代。

教育思想。张鸿《孔颖达》一书的突出特色是辟设专章论述孔颖达的教育思想。张鸿、张分田《孔颖达以“道”为核心的政治教育思想》(《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从以六经之道为本的教育理论、以尧舜之道为核心的教育目标、修习大学之道的教育过程和以正道训民的政治教化等四个层面深入分析了教育家孔颖达以“道”为核心的政治教育思想。此外,杨雅文《孔颖达的教育思想》(《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也涉及了教育思想这一问题。

二、《五经正义》研究现状

整体研究。就目前资料所见,或许因通读《五经正义》实属不易,所以其整体研究不多。台湾大学张宝三教授的《五经正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是其博士论文,从撰修版本、依据、注文、校勘、字义训诂、修辞、思想以及评价等方面对《五经正义》做了系统研究。日本学者野间文史所著《五经正义の研究:その成立と展开》(东京研文出版社,1998年)一书为文献学研究,包括《五经正义》的撰修、研究文献目录、征引文献考、版本与校勘等几个方面。申屠炉明《孔颖达 颜师古评传》虽名为人物传记,但主要是借助对孔颖达家世生平的梳理,以经学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视角对《五经正义》做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经学角度。潘忠伟《〈五经正义〉与北朝经学传统》(《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指出在撰修《五经正义》之前,唐初官方学者所继承的主要是南朝的经学传统,而至撰修之时,则更注重北朝的经学传统,《五经正义》之旨趣,不仅在于继承南朝学术,也在于吸收北齐、北周及隋代的经学思想。唐太宗时由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以及明成祖时由胡广主持编纂《五经大全》,是中国经学史上两次最重要的经学文本厘定之举。秦学颀《从〈五经正义〉到〈五经大全〉——关于唐、明二代经学统一的比较》(《孔子研究》2002年第1期)从编纂背景、撰修目的、文本选择、纂修原则等几方面对二者的异同做了深入辨析。

文献学角度。《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钟明立《〈五经正义〉的“对文”和“散文”》(《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指出《五经正义》中“对文”和“散文”是一套分析古代词义,且主要是分析同义词的训诂术语。作者认识到经传中同义词相对使用时其义有别,单独使用时其义相通的特殊现象,创造性地配合使用“对文”和“散文”来进行分析,开启了对同义词进行综合训诂的先河。马萃泽《〈五经正义〉引〈说文〉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对《五经正义》中所引《说文》各条进行了穷尽式辑录,与今通行大徐本进行了逐个比对,辨析异同。窦秀艳、杜中新《〈五经正义〉与“尔雅学”研究》(《井冈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对《五经正义》在征引《尔雅》及其旧注时的训释特点、征引失误作了初步的探讨。白长虹《〈五经正义〉及其研究综述》(《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主要对《五经正义》的撰修、版本、内容、研究状况做了简要综述。

文学角度。杨乃乔、李丽琴《唐代经学阐释学与两种文学观念的悖立——兼论《五经正义》的阐释学方法与原则》(《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指出《五经正义》通过重新强调与阐释儒家经典并被作为科举教材,使儒学失却了其作为知识分子在信仰上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据,由信仰沦为教条。在此经学背景下,一方面是先秦两汉元文学观念在唐代的复归;另一方面是世俗唯美主义文学观念完全悖立于《五经正义》的阐释学方法与原则之外而存在。唐代经学阐释学及两种文学观念之间的学理元素在中西阐释学思想的互视中得以显现。王海英《孔颖达〈五经正义〉与唐代文论》(《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认为《五经正义》中的文论观点是唐初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五经正义》重新肯定了儒学的价值系统,成为官方教科书,从而对整个唐代文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高林广《〈五经正义〉诗乐思想管窥》(《内蒙古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指出《五经正义》中关于诗本体、情志为一及诗乐关系等问题的论述,对于研究唐代乃至中国诗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霍松林《“诗述民志”——孔颖达诗歌理论初探》(《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1期)认为孔颖达体现在《毛诗正义》里的诗歌理论,具有强调表达民情、揭露弊政、批判现实等特点,值得重视。

三、各经研究现状

《周易正义》研究。(1) 修辞注疏类。龚鹏程《〈周易正义〉之编撰》(《周易研究》2006年第4期)认为唐代为五经撰正义,为注疏统一之始。《周易正义》调融南北,荟萃诸家,故用王而不固于王;参以玄言,故义理架构颇与老庄相通;渐染于浮屠,故排佛而用佛;发明义例、考辨意旨,自下新义,故有学术价值可言,尤宋人疑古开新之先导,非株守一先生说者可比。倪淑娟《〈周易正义〉的注疏特色》(《周易研究》2010年第5期)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孔颖达注疏《周易正义》受南北朝义疏的影响,即以一家之注为底本,兼采诸经、诸家之说,在学术上显示了兼容并包的盛唐气象。杨鉴生《〈周易正义〉的修辞解释方式》(《宁德师专学报》2009年第3期)指出《周易正义》注重运用修辞方法、修辞原则、修辞功能与效果等方式解释《周易》经、传、注,一方面维护了《周易》作为经典的恒定性以及作为解释天道、人事的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在疏不破注的前提下,尽可能阐发独到的微言大义。(2) 哲学思想类。赵荣波《〈周易正义〉的宇宙观》(《文史哲》2008年第4期)、《从“纠偏”看〈周易正义〉的经学和哲学价值》(《周易研究》2008年第3期)等文章认为《周易正义》虽以魏玄学家王弼、晋韩康伯之注作底本,且基本坚持疏不破注原则,但该书还是力图对王弼的玄学易进行纠偏,其中宇宙观方面的纠偏倾向是其立论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这种自觉地纠偏倾向和兼收并蓄的做法既是唐代大一统文化的缩影,又反过来强化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刘玉建《汉魏易学发展的理论结晶——〈周易正义〉——学术及政治视野下的创作动因审视》(《周易研究》2006年第5期)从学术及政治视野分析了《周易正义》创作的三个历史动因,即学术与政治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产物;立足王注、倡导义理的时代必然选择;博取众家、熔于一炉的学术必然归宿。胡士颖《关于〈周易正义〉“道”概念的理解与辨析》(《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认为孔疏对“道”这一基本范畴有全面、深入的论述,但只有在对无、易、太极、一、太虚、神等重要概念与道的同异辨析基础上,才可能理解孔疏道器体系推衍的始点和易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周易正义〉道器思想述

论》(《红河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通过对孔颖达道论、器论分别剖析的基础上,指出孔疏道器关系具有形上形下、有无、体用三种最重要的关系,孔疏道器思想具有深刻性、创新性。刘顺《〈周易正义〉“象”论述略》(《兰州学刊》2007年第8期)指出孔疏象论以象之分层对治王注因意分层而轻象的不足,从而调和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周易正义〉对唐诗的影响》(《江淮论坛》2007年第5期)认为孔疏关于象论的创新对唐诗的创作以及唐代诗歌批评理论中的意境学说提出具有直接的理论刺激作用,易史结合,是唐代文学文化精神逐步确立的两大思想来源。此外,赵荣波《〈周易正义〉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略谈》(《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指出《周易正义》不仅表现出融合象数和义理两种注经方式的解易倾向,而且是儒道合流发展到唐代的一个具体展现形式,并对宋代易学的注经方式起到了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

《毛诗正义》研究。(1)文学类。蒋方、张忠智《试论〈毛诗正义〉之“文势”说》(《北方论丛》2003年第4期)认为《毛诗正义》吸收了魏晋以来的《诗经》研究中注重文辞义理的动向,形成文势说。其重在解决经、传、笺之间的扞格,强调诗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阐释义理不能脱离诗的整体,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黄贞权《〈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船山学刊》2010年第2期)、孔颖达《毛诗正义》文学文化阐释点见》(《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9年第1期)、《比兴的审美阐释——以孔颖达〈毛诗正义〉为例》(《名作欣赏》2007年第22期)等文章认为孔颖达提出了情志一也、诗缘政、兴象等一系列诗学命题,启蒙有唐一代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李金坤《孔颖达〈毛诗正义〉对经学与诗学的贡献》(《江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认为孔颖达《毛诗正义》在孔子删诗问题、三颂体制差异、三体三用说、赋比兴释义、六义排序、《诗经》章句结构及用韵等诸方面均有创新之处,具有丰富而鲜明的诗学因素。杨金花、潘桂云《以文逆意——〈毛诗正义〉解诗特征之一》(《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3期)指出孔疏总体上本着疏不破注的原则,但在具体疏解中,以文逆意,更加注重《诗经》作品本身,在经学体系内维护了经义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赵棚鸽《〈毛诗正义〉“孔子删〈诗〉”观及其成因》(《唐都学刊》2010年第3期)指出《毛诗正义》总体赞成孔子删《诗》说,但认为并非皆由孔子删编,并分析了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谢建忠《论〈毛诗正义〉对李益诗歌的影响》(《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论〈毛诗正义〉与李白诗歌》(《时代文学》2008年第1期)分析了《毛诗正义》对李白、李益诗歌的影响。刘挺颂《析〈毛诗正义〉对〈诗经〉的文学解读》(《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认为《毛诗正义》较详细地探析了《诗经》作品的篇章结构、章旨以及前后篇章之关系,深入研究了作品的修辞表达,对作者之意和诗篇主人公的思想有细致的分析和把握。(2)注疏修辞类。“疏不破注”是唐人疏注时遵循的一个原则和体例,对唐代训诂及后世训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也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韩峥嵘、张利《〈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考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指出一般认为《毛传》、《郑笺》都是《孔疏》“疏而不破”的“注”,其实不然。所谓“疏不破注”,不是“疏不破传”,而是“疏不破笺”,并举数例证之。韩宏韬《考论〈毛诗正义〉对〈毛传〉、〈郑笺〉的批评——兼驳“疏不破注”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认为《毛诗正义》的阐释原则不仅立足客观,而且具有多元性;它以经学为本,肩负起陶铸君臣人格、规范人伦秩序的神圣使命,《毛诗正义》表现出进步的文学思想,不仅丰富发展了经典的政教意义,而且深刻揭示了诗歌的文学本质。陈

广恩《论“疏不破注”——以〈毛诗正义〉为例》(《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认为疏在维护经学正统地位、巩固封建统治中是严守注的思想体系,即不“破”注;但从语言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疏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破”注的。其他涉及《毛诗正义》版本、修辞、语法、校勘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冯浩菲《〈毛诗正义〉通达训释诸例概述》(《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通过六类词义训释条例分析了《毛诗正义》立论通达的特征。何毓玲《试论〈毛诗正义〉疏经语言中的状貌词词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以状貌词词尾分析为例解析《毛诗正义》中蕴含的可贵的语言材料。孙良明《孔颖达〈毛诗正义〉中的语法分析》(《古汉语研究》1992年第1期)以孔颖达《毛诗正义》中语法分析为据论述了古代注释书语法分析在唐代的发展。王晓平《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发现日本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存《小戎》、《蒹葭》凡67行,是珍贵的《毛诗》资料。在对残卷逐字校读的基础上,从《诗经》文献学和中日文学交流史两方面,论述了其可贵的研究价值。罗英侠《从引书看〈毛诗正义〉的成书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指出《毛诗正义》引书有三个特征:从取材看,以经史为主,无门户之见;从宗旨看,以服务政治为根本目的;从方法看,运用礼学、训诂和讖纬解释经义。李慧玲《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尚书大传〉的异名辨析》(《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通过分类归纳孔氏所引《尚书大传》12种异名进行分类归纳,对由此引起的混乱进行了梳理和纠正。殷晓明《论孔颖达〈毛诗正义〉中的校勘》(《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认为孔颖达《毛诗正义》校勘方法多样,校勘态度极其审慎,孔氏理应在校勘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孔德凌《〈毛诗正义〉校勘拾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8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毛诗正义》做了进一步的校勘工作。韩宏韬《〈毛诗正义〉的编次观》(《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毛诗正义〉合刊本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等文对《毛诗正义》的单疏本、注疏合刊本以及编排次序做了系统探讨。

《春秋左传正义》研究。目前看到的代表性成果有安敏《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研究》(岳麓书社,2009年)一书。该书采用列表统计、比较辨伪等文献学方法,在考证孔颖达生平著述的基础上从文学阐释、史学阐释、语言阐释三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五经正义》的著述特点,总体来看还是偏重文献学立论。《论〈春秋左传正义〉释词的两个维度》(《五邑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指出《春秋左传正义》通过两个维度完成了语言阐释的基本工作:其一是以词语的构成情况、使用规律为背景进行释解的语言维度,其二是以词语的古今使用情况作为释解的方向,对词语作历时态观照的历史维度。《论〈春秋左传正义〉对〈史记〉的引证》(《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认为无论是肯定《史记》所记,还是批判《史记》之说,抑或是对《史记》之辨保持中立态度,都体现了《春秋左传正义》的编订者的尊史观念、求史之真的态度和坚持杜注的原则的融合。武群《孔颖达对词义辨析的研究——以〈春秋左传正义〉为例》(《兰州学刊》2010年第3期)指出孔颖达时代没有语义学理论,但在其正义中却体现出孔颖达对语义系统的初步认识,看到语义单位与语义单位之间存在的关系,如上下位关系、同义关系等。

《尚书正义》研究。相关研究相当少。杨云香《〈尚书正义〉反映的词汇观探索》(《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认为《尚书正义》多涉及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总结,有不少是前人所

未发的内容,如比较早地关注词义引申、最早提出对文的概念、比较早地揭示出复语现象等问题。这些资料对语言学研究弥足珍贵。喻遂生《〈尚书正义〉点校札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指出不仅阮刻本存在着不少漏校、误校、校记选录不当、刊刻新出错讹等问题,用唐石经等11种本子作参校,发现《四部备要》翻印本、世界书局及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等,也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

《礼记正义》研究。有关研究很少,且多关于版本、体例等方面的探讨。王锴《三种〈礼记正义〉整理本平议——兼论古籍整理之规范》(《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八行本〈礼记正义〉传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6期)、《字大如钱 墨光似漆——八行本〈礼记正义〉的刊刻、流传和价值》(《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5期)等文主要考察了八行本《礼记正义》的情况。其他成果还有,周越《越州本〈礼记正义〉版本述略》(《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4期)、简硕《关于〈礼记正义〉的体例》(《编辑学刊》2000年第5期)等。

四、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问题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孔颖达与《五经正义》在中国经学史、思想史领域的地位而言,对孔颖达及《五经正义》的研究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薄弱的。

首先,有关孔颖达及其思想研究方面,一方面系统全面的整体性研究的论著匮乏;另一方面在孔颖达思想的探讨上偏重易学、美学立论,对其经学思想、政治思想研究严重不足。

其次,《五经正义》整体研究是比较匮乏的,现有研究成果多侧重编纂体例、版本、校勘、训诂等方面的研究,对其思想研究力度不够,有待大力全面开掘其哲学思想、经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等领域的研究。相关专题研究对文学思想、经学思想虽有所涉及,但还有加强深度研究的必要。

再次,各经研究不仅不均衡,主要集中于《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研究,而且整体研究都比较薄弱。即使《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但在立论角度上还是比较狭窄的,《周易正义》集中于从文献学、哲学角度,《毛诗正义》侧重于文学角度、文献学视角,而且还有待做深入探讨。其他三经的相关研究成果则寥寥可数,且基本是从文献、训诂、版本、校勘角度立论。对于各经的经学思想研究基本处于整体匮乏状态。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即对孔颖达与《五经正义》的思想研究关注不够。隋唐时期的儒学正处在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两个高峰之间,既不像前者那样独尊专宠,又不像后者那样博大精深,加上《五经正义》奉敕而撰,注疏经传,并非私家著作,这或许是孔颖达与《五经正义》未受到应有重视的尴尬地位的主要原因。但选定注本,摒弃诸疏,博采众长,定于一说,本身就反映着一种观点(刘泽华、张分田《孔颖达的道论与治道》,《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孔颖达是唐代的经师鸿儒,由其主持编修的《五经正义》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有必要加强孔颖达与《五经正义》的经学思想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研究。